

知恩院

知恩院山號華頂山，是日本淨土宗總本山。其寺位於京都市東山區林下町，地處東山半山之上，背倚東山華頂峰，借足山勢。寺之三門五間二層，寬五十米，高二十四米，樓頂用瓦七萬塊，位列京都“三大門”之一，巍峨莊嚴，端正古樸，渾厚壯美。

日本佛教淨土宗是日本佛教最早出現的宗派。

佛教於公元前五、六世紀興起於古印度，公元前後傳入中國。公元六世紀傳至日本，時間有兩說，一說是在公元 538 年，一說是在公元 552 年。半個世紀後，著名的聖德太子（574-622）擔任總攬朝政的攝政，推行重儒重佛的政治理念，並通過公元 604 年頒佈的《憲法十七條》而成為國家法令，佛教在日本的勢力遂得以迅猛壯大。公元 710 年日本國都遷至平城京，即今奈良一帶，日本佛教形成包括華嚴宗、法相宗、三論宗、成實宗、俱舍宗，以及大唐鑒真和尚（688-763）所傳律宗在內的“奈良六宗”。

公元 794 年即唐德宗貞元十年，日本延曆十三年，桓武天皇（781-806 年在位）將國都再遷平安京，即今京都一



知恩院（高一丁 攝）

帶，日本史進入到“平安時代”（794-1191）。公元 805 年即日本延曆二十四年，日僧最澄（767-822）自唐歸國，次年日僧空海（774-835）自唐歸國，他們在新的國都，分別開創了天台宗與真言宗。

“奈良六宗”及天台、真言二宗，是日本早期佛教的主流力量。

迄至十一世紀後期，日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發生巨變。自然方面，公元 1083 年即日本永保三年，富士山火山爆發；公元 1108 年即嘉承二年，淺間山火山爆發，自然災難導致氣候異常，人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社會方面，公元 1180 年即安元六年爆發了源氏與平氏兩大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的戰爭，即“源平合戰”。公元 1192 年即南宋光宗紹熙三年，日本建久三年，“源平合戰”中的獲勝方源賴朝（1147-1199）就任征夷大將軍，在鎌倉設立名為幕府的新國家行政機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全面更新，開啟了日本歷史上長達近七百年的幕府制時代。

在幕府制興起前後的歷史大轉折裡，日本佛教原有格局也被打破，其情形卻與佛教在印度起源階段頗有幾分相似。季羨林先生在《佛教十五題》中說：

釋迦牟尼時代，正是印度古代現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有點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學說，風

起雲湧，百家爭鳴，莫衷一是。從各方面來看，都可以說是印度歷史上一個轉折點。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在《日本的肖像畫與鎌倉時代》（劉克申譯）文中，對於這一時期的日本的經歷，精彩論述說：

筆者認為在日本思想開始活躍，出現個性化活動並湧現出大量天才的時期仍然是在藤原時代末期至鎌倉時代初中期這一期間。從宗教信仰的動搖到叡山一隅、橫河山中淨土信仰的萌發，如同真言宗的新義派、淨土思想的產生，這些都是當時思想覺醒的標誌。藤原時代，淨土教也已被貴族化的趣味所束縛，開始產生如同《山越阿彌陀》、《二十五菩薩來迎圖》所表現出的奢華思想，而到鎌倉時代初期，權力思想的覺醒影響到地方武士，其結果是當時興盛的宗教思想適合了地方武士的簡樸生活，於是產生了淨土宗、真宗、日蓮宗，其創立者皆為一代天才。

日本的舊有主流八宗在此一轉折中，勢力大幅度減弱。新興宗派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淨土宗、禪宗臨濟宗、禪

宗曹洞宗、淨土真宗，日蓮宗即法華宗、時宗等次第登場；法然、榮西、圓爾，夢窗、道元、親鸞、日蓮、一遍等大德高僧宣講學說，開宗立派。舊有宗派中也湧現出如華嚴宗明惠、律宗俊芿、法相宗貞慶、三論宗明遍等一批新的代表人物，還有蘭溪道隆、無學祖元、一山一寧為代表的渡日漢僧助力其間，日本佛教亦如中國諸子百家爭鳴之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盛況，有力地帶動了日本思想、社會、文學、藝術等諸多領域發展。日本佛教由此與日本歷史形成不可分割的緊密關聯，這應是日本佛教所獨有的一種特色。

淨土宗創立者法然

淨土信仰源於古印度，東漢末傳入中國，至東晉慧遠（334–416）、北魏曇鸞（476–542）而光大，盛於隋唐，而以唐初善導（613–681）為集大成者。即青《佛教的阿彌陀、觀世音和彌勒信仰》裡概述中國的阿彌陀淨土信仰說：

釋迦牟尼在王舍城向弟子們說法，說在過去久遠的時代，有個國王叫法藏，棄國出家，從一個叫做“世自在王”的佛學法。世自在王佛對他“廣說二百一十億諸佛剎土，天人之善惡，國土之粗妙，應其心願，悉現與之”。法藏深受啟發，在世自在

王佛面前許下四十八願，表示在他成佛以後，在他管轄的佛國淨土沒有地獄、餓鬼、畜生，一切眾生都可轉生到此處，過不愁吃穿，沒有任何苦惱的安閒自在的生活。後來法藏果然成佛，號阿彌陀佛（或譯作“無量壽佛”），其佛國在西方十分遙遠的地方，名為“極樂世界”。

中國的阿彌陀淨土信仰，約在平安時代傳到日本，日本天台宗的空也（903-972）提倡“踴躍念佛”，源信（942-1017）著作《往生要集》，良忍（1073-1132）主張“融通念佛”，都屬於受到中國淨土影響。

中國的阿彌陀淨土信仰，誠如湯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所說：

（隋唐）士大夫根本之所以信佛，即在作來生之計，淨土之發達以至於獨佔中華之釋氏信仰者蓋在於此。

蔣維喬著《中國佛教史》，與湯用彤先生的視角不盡一致，蔣注意到：

善導之念佛，與唐代之法相、華嚴、禪宗、密

宗異，最初即不與上流社會接近，以博下級人民之信仰為務。

日本淨土宗興起之際，則既有追求往生西方淨土世界的一面，同時也注重把佛教從貴族士大夫階層中解放出來，有力推動了佛教的大眾化。

日本淨土宗的創立者法然上人（1133–1212），沒有在中國留學的經歷，卻勇為天下之先，開創了淨土宗這一本土化佛教的第一個宗派。

法然是宣講“融通念佛”的良忍的再傳弟子，法名源空，號法然，今岡山縣人。出身於屬於當時新興社會階層的武士家庭，九歲（虛歲，下同）喪父，敢以小弓箭射傷殺父仇人，足見膽量過人。同鄉僧人聞而異之，收為弟子，旋覺其聰穎善學，轉薦到京都比叡山天台宗延曆寺和尚門下；延曆寺和尚又覺法然與眾不同，再薦給曾著作史書《扶桑略記》的名僧皇圓。法然十五歲，從皇圓受戒，學習天台宗。三年後，法然改入另一位名僧睿空門下，睿空即良忍弟子，法然自然而然地得到淨土薰陶。此後，法然轉益多師，先後又從多位名師學習法相宗、華嚴宗、真言宗、三論宗、律宗等各家宗派學說。最終，法然在四十歲以後，“乃棄所業，倡淨土專念之宗”（《元亨釋書》）。他深慕中國善導大師主張“念佛”的淨土學說，在《知恩講私記》裡曾說，“善導是彌陀



知恩院（高一丁 攝）

化身也”。楊曾文《日本佛教史》稱，法然尊曇鸞、道綽、善導，以及善導弟子懷感和有“後善導”之稱的唐末淨土名僧少康，為日本淨土宗的五祖。他在六十六歲時，在弟子們的協助下，完成了其最重要的著作《選擇本願念佛集》，闡述淨土心得。

《選擇本願念佛集》開篇即開宗明義，就提出與善導同樣的見解，“往生之業，念佛為要”。法然論述說，阿彌陀佛在《無量壽經》裡所發諸願，唯“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當是阿彌陀佛之“本願”。世間所有眾生，不分貴賤，不分男女，不分善惡，都可藉助阿彌陀佛發願大力，亦即“他力”，而得往生極樂淨土。信仰淨土的方法又至為簡單，即善導《觀無量經疏》中所云，“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

日本通常以公元 1175 年即承安五年，法然上人公開講說專修念佛作為淨土宗的開端。楊曾文著《日本佛教史》，則認為公元 1198 年即建久九年，法然《選擇本願念佛集》問世，“標誌著日本淨土宗的正式形成”。

法然在日本創立淨土宗，必要破除來自舊有宗派的阻礙。

公元 1186 年即日本文治二年（一說在公元 1189 年即文治五年），天台宗名僧顯真約請法然至京都北部大原的勝林

院講說淨土教義，雲集各宗名僧，與法然進行討論，據說多為法然折服。這就是記入日本佛教史的“大原談議”。

法然也曾經贏得過高倉天皇與攝政九條兼實等皇室貴族的支持，然而高倉天皇與九條兼實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擁有權力的程度與時間都非常有限，無法給與法然更多幫助。

所幸的是，法然遇到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

此時正逢日本“平安時代”即將宣告落幕，國內政治出奇混亂。一面是權臣外戚藤原家以“攝政”“關白”名義把持朝政，一面是天皇接二連三退位為“上皇”，並用“上皇”或“法皇”（“上皇”出家改稱“法皇”）名義實行“院政”。同時還有武士階層的平氏與源氏分別形成強有力的地方政治軍事集團，各種政治勢力鬥爭激烈。

源賴朝的鎌倉幕府創設之初，改朝換代，人事皆非。正如美國的日本史學家霍爾（John Whitney Hall）《日本：從史前到現代》（鄧懿、周一良譯）裡所說：“鎌倉時代宗教的覺醒不僅是新階級興起的結果，而且生活和文化的模式也在變化”。“鎌倉的覺醒部分也是對舊有的佛教教團的反應，對天台宗和真言宗的神秘的反應，對奈良六宗派對人生所持的等級觀念的反應”。“十三世紀出現的新宗派，把佛教的教義介紹給最尋常的俗人，並開闢了拯救眾生之路。新的宗教使佛教的原則大眾化，並主張更直接地以情感表達信念，也就是教義的自由化”。

法然與他的淨土信仰，恰逢其時地迎合了時代需求，迎合了一般民眾的需要，成為佛教新興宗派的代表，很快在社會上贏得武士及庶民的歡迎。

霍爾在《日本：從史前到現代》裡敘述說：“第一位和這個舊教團決裂的是法然上人，他在 1175 年創立了淨土宗”。“法然上人宣講人不能通過自己的力量救自己，因為人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得救。他聲稱人要尋求解脫痛苦和死亡之道，必須認識到只有相信佛的原始誓言，才能得救。這種信念必須以最大的誠心重複佛的名字。對法然說來，念佛就足夠了，別的什麼都不需要——不要廟宇，不要寺院，不要什麼宗教儀式或者僧侶。而且在佛的眼中，一切都是平等的——高和低，男和女。這種極端的看法自然受到原有宗派的反對，在 1207 年他就被放逐出京都。此後他漂泊各地，結果進一步傳播並普及了他的教義”。

事實上，法然傳播淨土信仰的過程，較之霍爾敘述更為坎坷，他遭遇到來自佛教與政治的雙重責難。

先是公元 1204 年即元久元年，京都比叡山僧眾集會，一致反對法然淨土之說。法然作出《七條起請文》作為回應。次年，法相宗代表人物貞慶（1155–1212）是淨土的強烈反對者，他將與法然的論爭提升到政治層面，起草《興福寺奏狀》，上書京都朝廷，指斥法然的“專修念佛”有七大過失，要求予以禁止。



知恩院（高一丁 攝）



知恩院（高一丁 攝）

迫於舊有宗派壓力，公元 1206 年即建永元年，京都朝廷抓捕了法然的弟子行空、遵西。1207 年即建永二年，又發生了法然弟子住蓮、安樂與宮中妃嬪私相往來事件，愈發激怒朝廷，詔令禁止專修念佛，處死住蓮和安樂，強迫法然還俗並將其流放至今香川縣。

法然在流放途中，堅持傳播淨土教義。相傳他在今兵庫縣的高砂海邊，遇到一對漁民老夫婦。他們向法然訴說其自幼捕魚為生，難免殺生，如何才能死後不入地獄受苦？法然即告老夫婦，只要口稱“南無阿彌陀佛”，都能往生極樂淨土。老夫婦遂成為法然信徒，晚年果然安居樂業，健康長壽。日本戲劇能樂將這一故事編成劇目《高砂》，現在還時見於舞台。日本畫也常以此為題材，用於對老人的祝福。在戲劇與繪畫等藝術作品中，漁民老夫婦都是著日本裝束，表現的正是法然的淨土信仰。

公元 1211 年即建曆元年，七十九歲高齡的法然，被獲許回到京都。他結草庵於住蓮、安樂兩弟子遇難的東山鹿谷，為弟子祈禱冥福。天台宗的座主慈鎮慈圓（1155–1225），是著名的和歌詩人和史學家，還是法然的支持者九條兼實兄弟，他雖未必接受淨土信仰，卻不忍坐視法然飽受磨難，出面幫助法然移住到青蓮院附近的大谷禪房。

公元 1212 年即建曆二年，法然在大谷禪房示寂。逝前，法然應弟子源智（1183–1238）之請，口述《一枚起請

文》。楊曾文《日本佛教史》收錄其全文：

既非唐土，我朝諸智者所教觀念之念佛，亦非以做學問去悟念佛之心之念佛，唯為往生極樂而稱南無阿彌陀佛，以此則無疑往生。別無其他也。所謂三心、四修，為“稱南無阿彌陀佛，決定往生”之所具。如謂此外尚存深義，既不合釋迦、彌陀二尊垂憐之意，亦不在彌陀本願之中。凡信奉念佛者，即使通曉佛一代聖法，也與一字不識之愚鈍者、比丘尼中無智識輩等同。無需為智者所行，唯應一向念佛。

三心，指的是《無量壽經》裡的誠心、深心、回向發願心。四修，指善導《往生禮讚》裡所說的四種修行淨土的方法，恭敬修、無餘修、無間修和長時修。法然文中強調，日本人與中國人，文化程度不同。如果日本人用“做學問”的方法念佛，那是行不通的；“唯為往生極樂而稱南無阿彌陀佛，以此則無疑往生”。楊曾文解釋《一枚起請文》說，法然在此文中“倡導的是口稱彌陀名號的念佛；念佛者不論富貴與貧賤、智者與愚者，都可往生淨土”。

法然逝世當日清晨，高聲誦起佛號，眾弟子隨之唱誦；久而弟子多音啞，只有法然直誦至正午，繼而又誦《光明遍

照偈》，誦畢，溘然長逝。

法然雖逝，並未能緩解淨土宗與舊有宗派的矛盾，法然墓一度還被毀壞。法然晚年隨侍弟子源智保存了恩師遺骨。源智為對恩師報恩謝德，於公元 1234 年即文曆元年，以大谷禪房為基礎，建寺作為淨土道場，後世即以此為知恩院之濫觴。法然其餘弟子分散各地，繼續傳播淨土教義。百餘年後，鎌倉幕府接近尾聲，公元 1331 年即弘元元年，京都大地震後流行大疫，淨土僧人空圓善阿用七晝夜誦阿彌陀佛名號百萬遍除厄，熱衷於恢復皇權的後醍醐天皇聽說，大為感動，賜善阿之寺名“百萬遍”，這是淨土宗最初獲得的官方認可。

公元 1338 年即曆應元年，足利尊氏開創室町幕府。室町時代（1338–1573）最受到重視的佛教宗派是禪宗，但淨土宗也獲得了自由發展的空間，興建起若干廟宇。公元 1467 年即應仁元年，幕府因繼承人問題而引發“應仁之亂”，京都陷於戰火，新建的淨土寺廟多毀於戰火，僧人們只得奉法然影像遠離京都。

繼室町幕府而起的是軍事領袖織田信長（1534–1582）、豐臣秀吉（1536–1598），史稱“織豐時代”或“戰國時代”（1573–1600）。織田信長對佛教舊有宗派極度不滿，竟然派出軍隊焚毀比叡山；豐臣秀吉則用改造京都城市的名義，將寺廟遷移至指定地點集中管理。昔日受舊有宗派壓制的淨土

宗，反是得到織、豐的禮遇，法然弟子源智所建知恩院，在織田信長時代被明令確定為淨土宗的總本山。

公元 1603 年即日本慶長八年，德川家康（1542–1616）在江戶即今東京設立幕府，淨土宗在江戶時代（1603–1867）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德川家康既大興儒學，又禮敬佛教和日本神道教，巧妙地維繫著三者間的平衡。佛教各宗派中，家康重用禪宗僧人，自己則皈依淨土宗。公元 1604 年即慶長九年，他命令分割天台宗寺院青蓮院的土地為知恩院擴建廟宇，次年又親詣知恩院。公元 1619 年即元和五年，德川家康之子秀忠（1579–1632）繼任將軍後，親自主持知恩院三門建造工程，彰顯江戶初期強盛國力，留下不朽的建築傑作，今已列為日本“國寶”。公元 1697 年即元祿十年，東山天皇追諡法然為“圓光大師”，這是法然身前身後所獲得的最高榮譽，淨土諸寺及信眾皆以此尊稱法然而不名。

知恩院的新年鐘聲

作為江戶時代初期的建築，知恩院三門毫無疑問是經典之作，雄偉壯觀而又帶有些炫耀。三門沿山坡再用十幾級石階墊起，門上更起一樓，二樓用日本所謂禪宗式樣，其實即中國南宋的模式，樓外高懸靈元天皇御筆楷書“華頂山”匾額，風格與京都幾個著名大寺協調一致。經過三門，登石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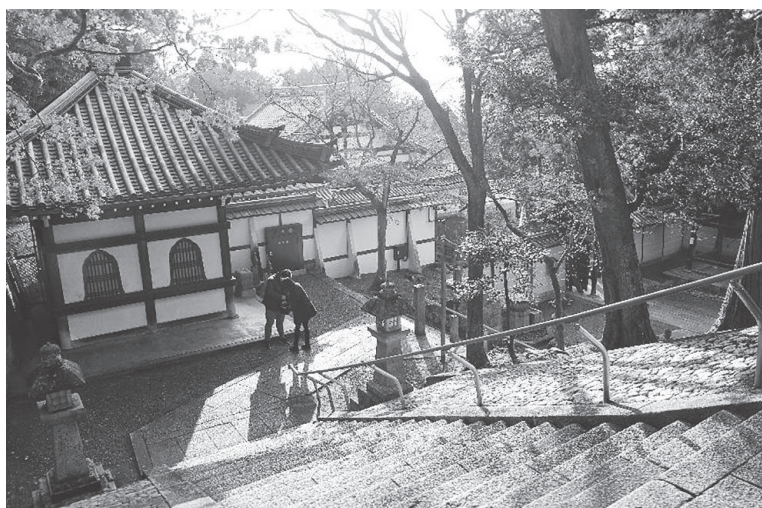
知恩院（高一丁 攝）



知恩院（高一丁 攝）



知恩院（高一丁 攝）



知恩院（高一丁 攝）

數十級，豁然開闊為廣場，本堂、御影堂、方丈、鐘樓等建築群散建於廣場之上。本堂內奉有善導大師的木像及畫像，二像都被列入日本“重要文化財”。寺的主殿為供奉法然影像的御影堂，寬四十五米，深三十五米，其宏大規模與三門遙相呼應。

關於知恩院，日本民間尤為膾炙人口的，是“七大不可思議”之說。第一大不可思議，是三門二樓陳列兩口白木棺材，傳云係建造三門的工匠夫婦完工後自殺，而留棺此處的用意卻不能明白。其二是，從御影堂至方丈之間建有五百五十米的走廊，走在走廊的木質地板上，地板會發出如黃鶯鳥叫的聲音。體重約五十五公斤的筆者，曾多次嘗試用不同姿勢，儘量輕緩地踏上去，但是無論怎樣都會聽到如黃鶯般的叫聲。其三是御影堂屋簷下有一把油傘，據說是白狐所化，為了保護廟宇避免火災。其四是大方丈房梁上有一把二半長的木勺，完全不知其用途。其五其六，均與名畫家狩野信政為知恩院所繪之畫相關。江戶時期，某種意義上，還在延續著“織豐時代”的審美，“狩野派”的畫風同樣得到重視。早在織田信長雄霸天下之時，天才的畫家狩野永德（1543–1590）以鮮明的現實主義感創作精確、多彩、生機勃勃的壁畫，創立了日本美術的“狩野派”。作為其繼承者，狩野信政為知恩院創作了《貓戲圖》與《紅白菊鳥雀圖》兩幅“不可思議”的畫作。《貓戲圖》從左中右三個方向觀看，

都能對視到畫中貓媽媽的眼神；而《紅白菊鳥雀圖》，紅白菊花燦爛清晰，鳥雀處卻只留些模糊的痕跡。寺中的解釋，是因畫得過於生動，畫畢鳥雀竟展翅飛去。知恩院的“不可思議”之七，是原青蓮院遺存下來的“瓜生石”，傳聞說巨石中曾生長出過瓜蔓。如今日本遊客到訪知恩院，大多是要尋訪一下這“七大不可思議”。

知恩院最難得見的，當屬其所收藏的“國寶”，創作於鎌倉時代後期的《阿彌陀二十五菩薩來迎圖》與長篇連續繪卷《法然上人行狀繪圖》。《法然上人行狀繪圖》是日本美術史不可或缺的作品，全篇共四十八卷，每卷長約九米，描述的是法然創立淨土宗的艱辛歷程，是日本現存最長的畫卷。據日本學者考證，這幅罕有的巨製，在法然歿後二十五年，即公元 1237 年，日本嘉禎三年，就已開工，全部畫完則已到了十四世紀。內藤湖南有詩《題法然上人繪傳冊》題之，詩云：“高躅千秋彩繪碧，專修念佛法門長。鼓懸落日生歡喜，便睹白毫常寂光”。詩中滿是對法然的讚美。

知恩院最為今日日本社會所熟知的，莫過於新年的鐘聲。每年元旦是日本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日，NHK 電視台都會在零時播放知恩院敲鐘的鏡頭。知恩院的巨鐘高三米三，重七十噸，為迎接新年，鐘鳴一百零八聲。名畫家、散文家東山魁夷（1908-1999）在其文章《除夜鐘聲》（陳德文譯）裡寫到：

從八阪來到圓山公園，知恩院的鐘聲充滿了肅穆的氣氛，在除夕之夜發出了第一聲鳴響。

踏入山門，鐘聲近了，彷彿就在體內深處旋蕩。不計其數的人群登上了築有鐘樓的小高岡。我沒去那裡，而是沿著大方丈的台階拾級而上。法燈靜靜地照耀著從天花板上長長垂吊下來的瓔珞，我朝著正殿供奉的莊嚴的神佛施了個禮，然後坐在套廊上，傾聽從對面山岡傳來的鐘聲。先是喊號子聲頻頻響起，短促的閃光將黑魆魆的繁茂的樹木映現出來——這是攝影的人使用了閃光燈。轉瞬間，“當”——莊嚴的鐘聲響徹天空，拖著長長的餘韻，深深地融進了黑暗的夜色中。片刻，又恢復了寧靜。接著又是號子聲、閃光，然後就是回蕩的鐘聲，不斷地重複著。

這座寺院的巨鐘有一根撞木，連著十一根纖繩。繩子的另一頭牽在一個人的手中。手握主繩的僧人，與其他人相向而立，喊號子的聲音與人的呼吸相和諧。大家手腳用足力氣，仰起身體用勁一拽，撞擊著巨鐘。

我合上雙眼，一邊想像著那光景，一邊傾聽鐘聲。這時候，許多人心中大概都會湧起對就要逝去的舊歲的依戀，對即將來臨的新年的小小期待吧。

年年歲歲積累起來的沒落的思緒，和正在降臨的新年所帶來的再生的希望交織在一起了。我在京都的旅途上，深深地體味到“新舊交替又一年”這旅人的感慨。

東山魁夷的這段文字，每每令筆者也有無限的感慨。十數年間，筆者幾乎都是在京都度過新曆元旦，且大多數時候都是與朋友、家人在一起。筆者的居所在京都北部，單從聽覺上說，很難辨出是否真的能聽到知恩院的鐘聲。在東山魁夷的文字裡，對於“閃光燈”之類的“現代”，似乎透露出些許的反感與諷刺。筆者與“現代”並無過多情緒，因為自家沒有電視，元旦多是在朋友家中，或是從隔壁鄰居家的電視裡，看到或隱隱聽見知恩院那均勻而悠長的鐘聲。知恩院現場人山人海，固然不是能隨意擠進去的，幾乎日本全國的老百姓，都如我的情況類似。法然上人創建淨土宗的時候，一定是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淨土巨剎會以這樣的方式，為芸芸眾生提供這般的俗世的樂趣。所謂“現代”，也依舊只是在“新舊交替又一年”裡的“一年”罷。

2025年7月1日北京修改稿。